

# 漫谈历史时期考古学的方法

## ——从安阳西高穴汉魏大墓的墓主推定说开去

许永杰

(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 广东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2009年河南省文物局公布:安阳县西高穴村抢救性发掘的一座汉魏大墓为魏武王曹操高陵。此消息立即在全社会范围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随着争论的持续扩大,争论的范围超出了墓主人身份的认定,而牵涉到考古学学科的科学性和权威性。由曹操墓引发的思考可知,应从考古学年代学、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互证、人文科学中的“孤证不立”等方面探讨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方法,这样既有利于学科的自身建设,又有利于平息社会对西高穴大墓墓主认定结果的不信任和对考古学研究的怀疑。

关键词:历史考古学 方法论 曹操墓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抢救性发掘的一座东汉大墓,经权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确认为魏武王曹操高陵。陈爱兰局长列举了支持这一认定的六条证据<sup>[1]</sup>:

(一)这座墓葬规模巨大,砖券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与已知的汉魏王侯级墓葬类似,与曹操魏王的身份相称;该墓未发现封土,也与文献记载曹操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情况相符合。

(二)墓葬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

(三)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出土鲁潜墓志等材料记载完全一致。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等文献记载,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病逝于洛阳,二月灵柩运回邙城,葬在高陵,高陵在“西门豹祠西原上”。考古调查资料显示,当时的西门豹祠在今天的漳河大桥南行一公里处,地属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这座大墓就在西门豹祠以西。1998年,西高穴村西出土的后赵建武十一年大仆卿司马都尉鲁潜墓志<sup>[2]</sup>,也明确记载魏武帝陵的具体位置就在这里。

(四)文献还明确记载,曹操主张薄葬,他临终

前留下《遗令》:“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也在这座墓葬中得到了印证;墓葬虽规模不小,但墓内装饰简单,未见壁画,尽显朴实。兵器、石枕等文字可证皆为曹操平时“常所用”之器,看似精美的一些玉器等装饰品也应是曹操日常佩带之物。

(五)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碑和石枕,证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据文献记载,曹操生前先封为“魏公”,后进爵为“魏王”,死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出土石碑、石枕刻铭称“魏武王”,正是曹操下葬时的称谓。

(六)墓室中发现的男性遗骨,专家鉴定年龄在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66岁吻合,应为曹操遗骨。

这一新闻一经发布,立即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众说纷纭的热议覆盖了众多媒体,因考古发现而引起如此广泛的震动这是空前的。究其原因,一则因为在中国,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的曹操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一则因为文物考古部门公布的确定墓主的“六大证据”众多人士认为没有一条是足以一锤定音的“铁证”。

鉴于社会各界对“安阳发现曹操墓”的热议和质疑。2010年1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王巍所长率12人组成的专家团赴现场考察了西高穴曹魏大墓,并于14日召开“社科院2009年公共考古论坛”,安阳西高穴曹魏大墓发掘主持人潘伟斌在论坛上公布了专家认定“曹操墓”的九大证据:

(一)墓葬的年代为东汉晚期。此墓葬为多墓室砖室大墓,形制与已发现的东汉晚期大墓相同,结合出土陶器、东汉五铢钱、画像石内容等多方面证据,专家们一致认定其为东汉晚期。

(二)墓葬规模与曹操身份相符。此墓葬与同期墓葬相比,规模宏大,气势不凡,结构复杂,埋葬较深,为王侯级的。

(三)墓葬地面情况符合《终制》。曹操建安二十三年六月,定下的《终制》曰:“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墓葬所处位置比三公里之外的北朝墓地高出10米;墓室上面未见封土,没有立碑迹象。

(四)符合文献资料记载的高陵位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终制》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唐《元和郡县图志·相州·邺县》:“西门豹祠,在县西十五里”,“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考古调查表明,西门豹祠位于邺城故城西,漳河南岸,今天的漳河大桥南行一公里处,地属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现在大墓所处的西高穴距邺城14.5公里。

(五)附近出土文物的旁证。1998年4月,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村民徐玉超在该村西北0.5公里处起土时,发现后赵建武十一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墓志记载:“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卅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

(六)称谓相符。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策命公为魏公”。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夏四月,“天子进公爵为魏王”<sup>[3]</sup>。曹丕代汉自立,建立魏朝,追尊其父为武帝,庙号太祖,此后曹操的称谓为魏武帝。因此曹操的爵位先为魏公,再为魏王、再为魏武王,后为武帝,是一个脉络十分清晰的过程。

(七)“魏武王”铭牌是其身份认定的直接证据。刻有“魏武王”三个字的铭牌共有7块,以刻有“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的石牌最为完整,均出于墓室之内。

(八)墓葬中发现的男性遗骨年龄为60岁左右,与曹操去世时年龄相符。

(九)出土物与曹操遗令薄葬相符。此墓葬所

出土的陶器都是素面陶,器型偏小,做工粗糙;金器都是生前衣物上所用之物,并未有为其入葬而特制的金玉器,只有圭和璧等礼器,均为石质,符合其在遗令中的规定。

平心而论,文物考古部门在论坛上列举的“九大证据”与此前在新闻发布会上列举的“六大证据”相比,并没有新的变化,社会的质疑也未因此而平息。不但如此,这场牵动全社会范围的大讨论,还涉及到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科学性、可信性和权威性,也因此引发了对考古学方法论的科学性和结论的可信性的深度思索。

一 解决年代是考古学的首要问题。

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的六大证据之二和九大证据之一,是将墓葬的年代定在“汉魏”和“东汉晚期”,这是推定墓主为曹操的前提。由于该墓没有碳十四等自然科学技术的测年数据,又未出土有纪年的遗物,在没有绝对年代的情况下,退求其次,只能提出“汉魏”和“东汉晚期”这样的相对年代。

在考古年代学的方法中,绝对年代的获得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碳十四等自然科学测年技术获得,一种是依靠有纪年的遗物认定。一般来说,史前考古学的绝对年代只能通过自然科学测年技术获得,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历史时期考古学(下文简称历史考古学)的绝对年代则主要依靠纪年遗物的考定来实现,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自然科学测年技术自身的局限性,即年代误差的存在,越是晚近的历史考古学,其年代误差越是难以接受。以碳十四测年技术为主要支撑手段之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业已结项,是否达到了预设的学术目标,大家都心知肚明。鉴于西高穴大墓是否为曹操墓的争论,有的考古机构试图对该墓进行碳十四的年代测定<sup>[4]</sup>,但是期待其将绝对年代锁定在建安二十五年的曹操辞世和下葬年份上是不可能的,倘若其测试结果仍是圈定在东汉晚期或汉魏之际,那又与目前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得出的相对年代结论有何区别?有何意义?

被盗的西高穴大墓未留下直接的文字纪年遗物,两汉时期的诸侯或列侯大墓出土文字纪年遗物者还是较为多见的。诸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墓铜勾罐上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铭文<sup>[5]</sup>;河北满城一号汉墓铜器和漆器上有“卅二年”、“卅四年”、“卅六年”、“卅七年七月”、“卅九年”等铭文<sup>[6]</sup>;北京大葆台一号汉墓残漆器上有“二十四年五月丙

辰丞”铭文<sup>[7]</sup>,等等。上举三座汉墓的年代都被定为西汉时期,其中南越王墓属西汉早期,满城汉墓属西汉中期,大葆台汉墓属西汉中晚期。《北京大葆台汉墓》报告作者认为“汉初诸侯王可以有自己的国号和纪年”,依此认识,西汉早期的南越王墓所出铜勾鐙铭文纪年可以理解为墓主南越文帝的在位年代,而西汉中期和西汉中晚期的满城一号汉墓和大葆台一号汉墓铜器和漆器上的铭文纪年,也认作是身份为诸侯王的墓主纪年就显不妥了。其实,汉代不但诸侯可以有自己的纪年体系,列侯也可以有自己的纪年体系,天子纪年与诸侯列侯纪年互见的情况屡见于《史记》各诸侯侯者年表,以及《汉书·诸侯年表》等,随翻即见。这种纪年体系不仅行于汉初,甚至延至汉末。清顾炎武《日知录》之“年号当从实书”条引《文选》之《魏都赋》刘良注:“文昌殿前有钟,其铭曰:‘惟魏四年,岁次丙申,龙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宾钟。’魏四年者,曹操为魏公之四年,汉献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如此,满城汉墓一号和大葆台一号汉墓中的纪年理解为身为诸侯的墓主的纪年是可行的。

目前,已发现的有纪年的西汉诸侯和列侯王墓葬,纪年多理解为墓主本身的在位年代,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sup>[8]</sup>,这两座汉墓的漆器铭文有“元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一年”等年数。报告认为,墓葬的年代属于早于武帝的西汉早期,漆器铭文纪年应指皇帝的纪年。推测“汉初纪年除了文帝有前元十六年的纪年外,其余纪年都没有超过八年的。因此漆器上的铭文‘十一年’应是文帝前元十一年的纪年”。据此年代,报告“推断双古堆M1主人是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

同属西汉时期,甚至同属西汉早期的诸侯王墓葬(如广州南越王墓和阜阳汝阴侯墓)出土的文字纪年,不同的发掘者和研究者会有不同的理解,基于不同理解而产生的认识出现不同的结果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了。西汉早期受封“汝阴侯”者四人:第一代夏侯婴,受封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死于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在位30年;第二代夏侯灶,文帝九年(公元前171年)嗣位,死于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在位7年;第三代夏侯赐,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嗣位,死于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在位31年;第四代夏侯颇,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嗣位,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畏罪自杀,在位19年。如果按“汉初诸侯

王可以有自己的国号和纪年”理解,将该墓的纪年理解为汝阴侯的在位年代,那么,双古堆M1的墓主就不可能是在位只有7年的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相反另外在位分别为30年、31年和19年的三位汝阴侯就都符合条件,都有可能是该墓的墓主。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纪年最复杂的时期,存在着多种纪年形式,天子纪年与诸侯列侯纪年并行,一元与改元并行,帝王纪年与年号纪年并行。墓中所出纪年铭文,不冠天子或诸侯而直书“元年”、“二年”、“三年”者,是指天子的在位年份还是指诸侯列侯的在位年份?如逢天子改元,那又是指“前元”、“后元”或“中元”?年号纪年始于汉武帝元鼎四年,而实施于何年?元鼎以前的“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是否为追记?年号纪年的纪年形式的出现,区别了天子纪年与诸侯列侯的纪年形式,但是否终止了诸侯列侯的纪年体系?所有这些,传世文献虽有线索,研究者并未取得一致意见,从考古实物的印证上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做铭文纪年为天子纪年还是诸侯纪年的认定时,作为铭文载体的器物应给予特别的重视。判定其制作机构是中央还是地方?如是中央制品,当天子纪年;如是地方制品,是诸侯列侯纪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地方制品是当地制品还是外地制品?如是当地制品,是诸侯列侯纪年的可能性大一些;如是外地制品,纪年的属性就又复杂了。订购的外地制品,是诸侯列侯纪年的可能性大一些;买进的外地制品,天子纪年的可能性会比诸侯列侯纪年的可能性大一些?客观地说,目前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还缺乏这样的深度思索和研究。

西高穴大墓为东汉晚期或汉魏之际的年代认识,是基于考古类型学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研究得出的相对年代结论。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自20世纪50年代发掘河南洛阳烧沟墓地并出版专题报告<sup>[9]</sup>至今,已有半个世纪的汉代考古学研究积淀,对于汉代考古学文化尤其是汉代墓葬的分期断代研究已很成熟,对于西汉早、中、晚,东汉早、晚各期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特征已有很好的认识和把握,因此,西高穴大墓的相对年代的判定是可信的。

《洛阳烧沟汉墓》作为中国考古学的经典文献,不但建立了汉代考古分期断代的标尺,还创建了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分期断代研究的一种范式。其分期断代研究的步骤如下:首先对墓葬形制进行分类研究。墓葬形制分为五类:第一型墓为平

顶墓,第二型墓为弧顶墓,第三型墓为单穹窿顶墓,第四型墓为砖室双穹窿与土圻抛物线顶墓,第五型前堂横列墓。从各型墓葬的发生演变看,后一型都是在前一型的基础上产生的,可以看出五型墓葬的逻辑关系和相对早晚顺序。其次分析随葬品的组合形式及其与墓葬形制之间的关系。出土于不同类型墓葬的随葬陶器形态不同,应是因时代的变化而呈现的演变;陶器的组合形式有四种:第一种是罐、鼎、敦、壶,第二种是仓、灶、井、炉,第三种是盒、案、杯,第四种是鸡、狗、猪。再根据这四种器物组合在墓葬中的搭配型式,结合具体罐、壶、仓、灶等典型器物的形态变化,总结出共有六个时期墓葬以及各期墓葬的典型器物。再次通过分析各期墓葬随葬铜镜,对各期做断代分析:第一期随葬草叶纹镜、星云镜;第二期随葬星云镜、日光镜、昭明镜;第三期随葬日光镜、昭明镜、变形四螭纹镜、四乳镜、连弧纹镜、规矩镜;第四期随葬四乳镜、规矩镜;第五期随葬规矩镜、云雷纹镜、夔凤纹镜、长宜子孙镜;第六期随葬长宜子孙镜、变形四叶纹镜、四凤镜、人物画像镜、三兽镜、铁镜。在传世铜镜中可比较的铭文铜镜有始建国天凤二年规矩镜(相当三期)、永平七年云雷纹镜(相当五期)、元兴元年人物画像镜(相当六期)。最后通过分析各期墓葬随葬钱币,对各期做断代分析:第一期到第六期均流行五铢钱,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为其上限,六期墓M147陶罐朱书纪年初平元年(190年)为其下限;第一期出武帝铸的第一型五铢钱;第三期后段出王莽钱;第四期出建武十六年始铸的第三型五铢钱。最后得出分期与断代结论:第一、二期为西汉中期及其稍后,第三期前期为西汉晚期,第三期后期为王莽及其稍后,第四期为东汉早期,第五期为东汉中期,第六期为东汉晚期。报告将墓葬形制分析和随葬品组合分析称作“相对年代”研究,将铜镜分析和钱币分析称作“绝对年代”研究,与现下的考古学研究相比,前者相当于“分期”研究,后者相当于“断代”研究。

《洛阳烧沟汉墓》的分期断代方法可以表述为:从遗迹遗物的类型分析入手的方法,在史前考古或早期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中也是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邹衡先生的《论先周文化》可以视作这种研究方法的一个典范<sup>[10]</sup>,笔者硕士论文所分析的各遗址和墓地的材料,即使用这种方法完成<sup>[11]</sup>。在史前考古学分期断代的年代学研究中,还有一种方法被广泛采纳和经常使用,张忠培先生的年代学

研究许多案例都是通过这种方法实现的。《试论东庄村与西王庄遗存的文化性质》一文<sup>[12]</sup>,对东庄村遗址的分期断代研究是这样的:首先筛选H24→H4一组层位关系,确定H24和H4两个典型单位;然后排定两单位小口尖底瓶的演变序列,进而扩展到瓮、罐、带流罐、盆等组合器物,最后得出仰韶晚期遗存的年代认识。与“从类型学入手的方法”相对应,这种分期断代方法可以称为“从层位学入手的方法”。笔者博士论文所分析的各遗址和墓地的材料,也都是使用这种方法完成的<sup>[13]</sup>。

如果将史前时期的这种从层位学入手的方法移植到历史时期的墓葬的年代学研究中,则可以转变为“从有纪年墓葬入手的方法”。其研究步骤可以设定为:首先选定有纪年的墓葬作为典型单位,以典型单位为分期排队的坐标点;然后比较典型单位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发现墓葬形制的差别与演变趋势,发现一种或数种器物的差别并归纳其演变趋势;再根据器物的共存关系,发现其他器物的差别及演变趋势,扩展有分期意义的器物种类;再根据墓葬形制的特点与演变趋势和随葬器物的特点与演变趋势,将没有纪年的墓例归进序列,完成全部材料的排队;最后在全部材料排队的基础上,寻求质变点,产生分期认识,归纳总结各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特征,给定各期年代。据笔者所见,目前在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中,尚缺乏典型的“从有纪年墓葬入手的方法”的研究。齐东方《试论西安地区唐代墓葬的等级制度》一文<sup>[14]</sup>,虽不是意在建立西安地区唐墓的分期与断代,但其对三个时期、五个发展阶段墓葬等级制度的划分、特征与演变研究,则是从纪年墓葬的分期研究入手的。

西高穴大墓未能提供层位学方面的相对年代证据,其实,在汉代的诸侯列侯墓葬中,也很少有层位学提供的证据。汉代诸侯王和王后的墓葬一般选择在王城附近的山岗上或坡地上营建,或是开凿山洞,或是开凿竖穴,这种方式决定了不同堆积单位之间的层位的贫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层位学的作用要小于史前时期。说其小不等于说其没有作用,程度降低而已。阜阳双古堆是西汉汝阴侯夫妇异穴合葬墓,“M2建在生土层上,M1是打破M2的封土后建造的,M2的时间应略早于M1,M2的死者应是夏侯灶的妻子”<sup>[15]</sup>,于此,层位关系可以断定两墓的相对年代早晚。



表一//摇西汉燕国八王、广阳国四王在位时间表

名称	在位时间	在位年数
燕王臧荼	高祖元年至五年 (公元前 206 ~ 公元前 202 年 )	5
燕王卢绾	高祖五年至十一年 (公元前 202 ~ 公元前 196 年 )	7
燕灵王建	高祖十二年至高后七年 (公元前 195 ~ 公元前 181 年 )	15
燕王吕通	高后八年 (公元前 180 年 )	1
燕敬王泽	文帝前元元年至二年 (公元前 179 ~ 公元前 178 年 )	2
燕康王嘉	文帝前元三年至景帝前元五年 (公元前 177 ~ 公元前 152 年 )	26
燕王定国	景帝前元六年至武帝前元朔二年 (公元前 151 ~ 公元前 127 年 )	24
燕刺王旦	武帝元狩六年至昭帝元凤元年 (公元前 117 ~ 公元前 80 年 )	38
广阳顷王建	宣帝本始元年至元帝初元四年 (公元前 73 ~ 公元前 45 年 )	29
广阳穆王舜	元帝初元五年至成帝阳朔元年 (公元前 44 ~ 公元前 24 年 )	21
广阳思王璜	成帝阳朔二年至哀帝建平四年 (公元前 23 ~ 公元前 3 年 )	21
广阳王嘉	哀帝建平四年至新莽始建国元年 (公元前 3 ~ 公元 9 年 )	12

二 文献印证的方法是历史时期考古学阐释的首选方法。

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的六大证据之三、之四、之五和九大证据之三、之四、之六、之七均与历史文献相关，文献记载对于历史时期考古学的重要性由此可窥一斑。其中，六大证据之五和九大证据之六、之七是关于确定墓主的文字遗物及相关历史文献。在已发掘的汉代诸侯列侯墓中出有直接确认墓主的文字遗物并不多见，更多的是像西高穴大墓那样虽有带文字的遗物，但多属不能直接证明墓主为何人的间接证据，墓主的“确认”尚需靠这些间接证据与相关文献记载的印证研究中推论得出。满城一号汉墓因出土大量的西汉五铢钱被认定为西汉时期，随葬的铜器铭文中“中山府”、“中山内府”、“中山宦者”字样，出土封泥作“中山御丞”，再结合下葬的豪华葬制和墓主身穿金缕玉衣的葬服，可以认定墓主为西汉中山王。铜器和漆器上的“卅二年”、“卅四年”、“卅六年”、“卅七年七月”、“卅九年”等铭文是认定墓主的最佳线索，查《汉书·诸侯王表》，十代中山王中只有在位42年的第一代靖王刘胜，可以满足铭文的在位年代，因此将墓主认定为刘胜。虽然墓中没有出土带有“刘胜”字样的印章等直接证据，迄今学界也没有异议。

大葆台一号汉墓的墓主认定也是靠纪年铭文与《汉书》相关记载的印证研究实现的。考古类型学和历史地理研究确认该墓主应是西汉燕王或广阳王，《汉书》记载西汉燕国八王、广阳国四王，见

表一。

在这十二王中确认墓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根据墓中残漆器铭文“二十四年五月丙辰丞”，在位要超出24年；二是根据墓中出土的钱币给出的时限，即大量见五铢钱不见莽钱——武帝元狩五年至新莽。燕王臧荼至燕王定国七王不满足条件二，可排除；广阳穆王舜、广阳思王璜、广阳王嘉三王不满足条件一，可排除；剩余燕刺王旦、广阳顷王建可同时满足条件二和条件一；最后再根据后世文献《水经注·鲍丘水》和《光绪顺天府志·地理志·冢墓》记载燕刺王旦陵在宛平县，可排除刘旦。所以，一号墓主应是广阳顷王刘建。这一认定过程使用的是排除法。

使用排除法会遇到无法排尽的问题，遇此问题就难以得出确定的结论，有时甚至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前举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如果铭文纪年是指墓主在位年代，使用排除法确定墓主就会排除一个，而剩余三个，显然解决不了问题。再如江苏徐州铜山龟山二号墓的墓主认定<sup>[16]</sup>，其使用的方法也是排除法。该墓的年代被认定为元狩五年始铸五铢的武帝时期或稍晚，据《汉书·楚元王传》，西汉楚国自高祖始封至新莽改为和乐郡，前后共十一位楚王。“后三个楚王时代稍晚，似与龟山二号墓无关”；前八个楚王中，第一代元王刘交至第五代安王刘道，均在元狩五年“废半两，行五铢”之前，亦与此墓无关；年代条件符合的有襄王刘注、节王刘纯、楚王刘延寿。在以年代条件无法排除的三王中，报告推测：刘延寿谋反国除，难以

营建如此规模的大墓;刘注即位于行五铢之前,墓中不见半两;节王刘纯的可能性最大。但是,报告刚刚发表,就在该墓的第六墓室发现一枚龟钮银印<sup>[17]</sup>,阴刻篆文“刘注”,表明此墓主当为襄王刘注,否定了报告以排除法得出的结论。

排除法是一种逻辑方法,环环相扣,它要求排除前提的正确性和排出过程每一环节的正确性,如果排除前提确立有误,后面的全部排除就都是无意义的;排除过程的某一环节出了问题,会导致后续环节的研究出问题。

西高穴汉魏大墓为曹操墓的六大证据之三和九大证据之四、之五是关于确定墓葬位置的文字遗物及相关历史文献。曹操死后葬在高陵,高陵在“西门豹祠西原上”是据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记载;而西门豹祠和高陵的准确位置是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相州·邺县》和后赵鲁潜墓志。《三国志·魏书》主要本自曹魏郎中鱼豢私撰的《魏略》,可权作为当世文献;而《元和郡县图志》和鲁潜墓志则是后世文献。虽然鲁潜墓志属于出土文献,加重了其作为历史文献的份量,但其记载的曹操墓位置仍不能作为定论,主要原因就是其文献性质是后世文献,是后赵建武十一年(345年)对东汉建安二十五年的追记,是曹操死后125年后赵鲁潜的下葬者对曹操墓所在位置的认识。1980年7月30日,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米文平等,在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的大兴安岭北部丛山密林中的嘎仙洞内,发现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石刻<sup>[18]</sup>。石刻共19行201字,内容为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派遣中书侍郎李敞来这里祭祀祖先的祝文。《魏书·礼志》对此事有载:“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嘎仙洞内壁上石刻祝文与《魏书·礼志》所记祝文大致相同。发现者对于嘎仙洞石刻祝文的发现意义是这样认为的:“可以确证,嘎仙洞即北魏拓跋鲜卑祖先居住的旧墟石室”;“它无可争辩地证实,我国古代民族鲜卑人自古以来就住在这里。石室的发现,结束了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拓跋鲜卑发源地和大鲜卑山方位的争论,解决了北方民族史上多年未决的一桩学术公案,为研究东胡系诸部族的地理、历史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准确的地理坐标和科学的依据”(文中下划重点线为笔者所加)。正史关于鲜卑族

源及居地的文献资料主要有三条:

《史记·匈奴列传》:“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汉初,亦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未常通中国焉”。

《魏书·帝纪·序纪》:宣皇帝推寅“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

嘎仙洞石刻的发现是否可以得出“鲜卑人自古以来就住在这里”的认识?鲜卑族系的旧居——战国时期为秦开所逐之前的居地和之后的“千余里”之地、汉初为匈奴冒顿单于灭国后退保的鲜卑山、东汉时期拓跋鲜卑首领推寅南迁告别的大鲜卑山——是否为同一地?是否都在嘎仙洞所在之地?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写作《鲜卑遗存的考古学考察》一文<sup>[19]</sup>时,同学刘晓东相告的他关于嘎仙洞的认识至今记忆犹新:嘎仙洞石刻只能说明北魏时期拓跋皇室听信邻人乌洛侯的说法,认为其祖先南迁的旧地——大鲜卑山在今大兴安岭北段的嘎仙洞。

嘎仙洞鲜卑石室对于认定鲜卑族发源地的意义颇类鲁潜墓志对于认定曹操墓位置的意义,虽都属“出土文献”,但仍是后世文献。宿白《白沙宋墓》被公推为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使用传世文献的典范,其使用的传世文献主要有二:一是北宋李诫的《营造法式》,一是北宋王洙的《地理新书》。

笔者在《盘活史前考古遗存的精华——〈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之我见》一文中写到:《中国模式》一书使用的第一种论证方法“是利用中国古代文献相关记载解释史前考古遗存。如以《论语·八佾》关于‘古社必树’的记载,说明史前时期竖立巨石的建筑为‘社’的论证;以《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关于黄帝活动范围和事迹的记述说明西阴文化的论证等。以后世文献说明前世史实,说服力不如当世文献;以神话传说为底本的后世记述传说时代的历史,文献价值更应折扣”<sup>[20]</sup>。当世文献与后世文献作为证据使用时是存在差别的,一般来说,后世文献可信程度及其对于论点的支撑力度弱于当世文献。

中国最早的当世文献能够确定的是出现在商

代晚期,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文献,而今人关于商代早期、夏代、五帝等传说时代的知识都是源自文字记录手段成熟后对前世的追记文献。从这种意义上讲,如果把历史时期定义为有当世文献记载的历史的话,那么,中国的史前时期与历史时期并由此而延伸的史前考古和历史考古的界限应定在早商和晚商之间,即殷墟为代表的晚商以后为历史考古,二里岗为代表的早商以前为史前考古。这样的划分还可以得到来自研究二里岗商文化和殷墟文化所使用的考古学方法的支持,商代早期及夏代考古学研究的方法同于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商代晚期考古学研究的方法则是历史考古学的研究方法。邹衡关于二里岗遗址的分期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是考古层位学与考古类型学的结合<sup>[21]</sup>,关于殷墟遗址的分期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则是考古层位学、考古类型学及甲骨文断代的结合<sup>[22]</sup>。

由于汉代诸侯墓中大多不见能够明确墓主的印章类文字遗物,仅靠间接证据的排除法推测以及后世文献的指示,所得出的结论具有不确定性,一些考古报告也都意识到这种结论的性质,如山东巨野红土山西汉墓,报告的结论是:“这座墓的死者以昌邑哀王刘髡的可能性较大”<sup>[23]</sup>。其实,即便是墓内出有死者的印章,墓主的认定也存在不确定性。河北石家庄市北郊小沿村西汉墓出有桥钮铜印,阴刻“长耳”,报告据此认定该墓为汉初赵王张耳墓<sup>[24]</sup>;山东曲阜九龙山三号汉墓出有印文为“王庆忌”的铜印章,发掘者据此认为墓主为鲁孝王刘庆忌<sup>[25]</sup>。但是,有学者专门撰文对其提出不同看法<sup>[26]</sup>。

### 三 历史考古学如何理解和掌握“孤证不立”?

“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是清代考据学的治学原则,是国学的精华。所谓“孤证”是指从一个角度或一个方面观察问题得出的认识,这种认识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苏轼名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讲的是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会导致结论不同;佛典《大般涅槃经》中盲人摸象的故事,讲的是观察事物局部而犯的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错误。与孤证不立相关联的问题是“多证可立”,那么,证据多到什么程度,结论才立得住?难道西高穴汉魏大墓的六大证据还不足以支撑墓主为曹操的结论,一定要九大证据才可以支撑吗?

黄展岳在《汉代诸侯王墓论述》一文中,对于如何识别诸侯王墓及认定墓主列举了多条证据:

“一般地说,诸侯王墓有高大坟丘,庞大而复杂的墓室,多层棺槨,随葬大量的礼乐器、饮食器、丝织衣物、金玉珠宝和真实车马,享有皇帝专用的黄肠题凑葬制和金缕玉衣葬服。墓内不难发现有朝廷赠赠的器物,王国标志的铭刻、封泥,书写王在位纪年的简牍,以及墓主的印章,等等……汉代立国四百年,诸侯王的特权、地位,以及丧葬制度,都在不断发生变化,除了墓中出有直接物证(如印章)可以判定为哪一个诸侯王以外,其他都只能作为参考,在综合各种参考资料进行分析研究以后才能做出判断。”<sup>[27]</sup>这段论述所列举的证据,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认定诸侯王墓的证据,包括墓葬形制方面的高大坟丘和庞杂墓室,葬具方面的多层棺槨、黄肠题凑葬制和金缕玉衣葬服,随葬品方面的大量礼乐器、饮食器、丝织衣物、金玉珠宝和真实车马以及朝廷赠赠的器物,王国标志的铭刻、封泥,书写王在位纪年的简牍,以及墓主的印章等;一类是认定墓主具体是何侯何王的证据,仅印章类的铭文遗物。前一类是间接证据,后一类是直接证据。

对于使用间接证据证明墓葬为诸侯王墓而言,需要遵循“孤证不立”的立论原则,仅有孤证是不能轻下结论的,即便有了多条证据也不宜轻下结论,还需对掌握的多条证据做综合分析,进行整合研究,证据与证据不相矛盾,相互咬合,才可作出推测。正如唐际根在中央电视台与马未都的对话中所讲的:考古学研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照证据,而是需要把证据像齿轮一样相互咬合。这样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笔者在《鲜卑遗存的考古学考察》一文中,倡议使用系谱分析的方法认定考古学文化的族属。此前,无论是考古学还是狭义史学研究考古学文化的族属问题,“大都是将古代民族活动的时间、活动地域和文化特征与考古遗存的年代、分布范围和文化特征进行类比。如果类比的结果是两相吻合,那么就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而系谱类比法则是“首先通过谱系研究确定考古遗存的系谱,然后将文献记载的古代民族系谱进行梳理,最后将两支系谱类比并得出结论。在类比的过程中,两支系谱的时间、地域和文化特征是认定吻合的三个基本要素”;“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实践表明,这种系谱类比法要优于简单的三要素类比法。这是因为系谱类比法是将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发展过程与文献记载的古代民族的发展过程类比,这种



类比是历时的；简单的三要素类比法是截取考古学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断面，与文献记载的古代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时期的情况类比，这种类比是共时的”。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如果放在本文的语境中，那就是系谱的类比方法与简单的三要素类比法相比，有了更多的证据支持，结论的可信程度得以提升。

其实，多条证据咬合成功，得出的也还是逻辑推理的结论，还不等于直接证据得出的实证结论。如果证据全都是间接证据，仅有量的积累是不够的。因为不能给量的积累到何程度就会引起质变下定论，何况量的变化不一定都能引起质变，间接证据积累多少都是间接证据——就像六大证据与九大证据一样，都不会转变为直接证据，只是增加了立论的可信程度，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

因为属于人文科学的考古学在具体研究中往往是使用间接证据立论的，其结论的正确性是相对的，孤证不可信，多证只是增加了可信程度，并没有改变结论的性质，结论的正确性还不是绝对的。由于研究者的认识和结论的正确与否存在相对性和绝对性，就要求研究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使用证据的性质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成果的可信性和可信程度，使用准确的语言来表述其研究。在《鲜卑遗存的考古学考察》一文中，笔者主要考察了两类考古遗存：一类遗存因有鲜卑汉化后的拓跋皇族大同东郊北魏元淑墓<sup>[28]</sup>作为直接证据，而表述为“与拓跋鲜卑活动有关的遗存”；另一类遗存因缺少直接证据，而表述为“可能与慕容鲜卑活动有关的遗存”。被盗的安阳西高穴汉魏大墓之六条证据或九条证据都属间接证据，根据这样的证据得出的结论是相对正确的，宜表述为：根据六条证据（或九条证据）的综合研究，墓主应是（或可能是）魏武王曹操。之所以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不能把话说绝，就差在墓内未存带有“曹操”字样的印章类的遗物，就差在缺乏足以一锤定音的直接证据。

说到一锤定音的带有人名字样的印章类的直接证据，话又回到了“孤证不立”上。笔者理解，历史时期的考古学如果出有文字资料，且可与传世文献相对应，就是直接证据，是可以作为“铁证”的，此孤证可立。甲骨文可证殷墟为商人晚期都城，利簋（武王征商簋）可证丰镐遗存是周人所为，“宛胸侯執”龟钮金印可证徐州簸箕山M3墓主为西汉楚元王刘交之子宛胸侯刘執<sup>[29]</sup>。

由于考古学之类的人文科学研究所使用的材料多属间接证据，所得结论大多是相对正确，所以研究者多希望能引进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获得直接证据，以求一锤定音。呼吁对安阳西高穴汉魏大墓出土的老年男性进行DNA技术鉴定，想法是质朴的，但是如何确定对比基因又是难以解决的。

业师张忠培199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一部文集，名之曰：《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sup>[30]</sup>，对此书名，我高度赞赏，极力推崇。考古学研究的认识和结论，不敢说是绝对真理，不敢说是历史的真实，但是我们没有走错路，我们是朝着绝对真理，朝着历史的真实走去。“走近历史真实之道”，这是一位资深学者凭半个世纪的学术追求，参透玄机，对考古学学科真谛洗练而精辟的表述。

[1]由于西高穴汉魏大墓的报告尚未发表，本文相关内容均引自相关媒体，本文在不影响原意的原则下有一定的文字加工，恕不一一注出。

[2]邓叶君、杨春富：《十六国后赵鲁潜墓志》，《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28日。

[3]建安二十一年“夏四月，天子进公爵为魏王”应为“夏五月，天子进公爵为魏王”。此为《三国志》原文。“夏四月”则为《后汉书》所载，原文为：“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后汉书·孝献帝纪》）当是先有“夏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之事，而后才有“夏五月，天子进公爵为魏王”之事。汉献帝对曹操由公爵到王爵的进封只是对既成事实的追认。案陈寿撰《三国志》事在晋初，晋代魏故事与魏代汉故事同。陈寿为当世人，不敢不为当世者掩，故略去“夏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事，仅书“夏五月，天子进公爵为魏王”事。范晔撰《后汉书》，事在南朝宋文帝世，此去陈寿撰《三国志》约为130年，世移境迁。作为宋人的范晔已与魏晋无涉，故不可能再为曹操讳掩，故于《后汉书》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条下，直书“曹操自进号魏王”事。

[4]张雪莲：《<sup>14</sup>C测年用于西高穴墓葬的年代测定》，《中国文物报》2010年2月3日第2版。

[5]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40~44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336页。

[7]大葆台汉墓发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54~55页。

[8][15]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 [9]洛阳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
- [10]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 [11]许永杰:《河湟青铜文化的谱系》,《考古学文化论集》(3),文物出版社1993年。
- [12]张忠培:《试论东庄村与西王庄遗存的文化性质》,《考古》1979年第1期。
- [13]许永杰:《黄土高原仰韶晚期遗存的谱系》,科学出版社2007年。
- [14]齐东方:《试论西安地区唐代墓葬的等级制度》,《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 [16]南京博物院:《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 [17]南京博物院:《<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一文的重要补充》,《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 [18]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
- [19]许永杰:《鲜卑遗存的考古学考察》,《北方文物》1993年第4期。
- [20]许永杰:《盘活史前考古遗存的精华》,《中国文物报》2007年9月12日。
- [21]邹衡:《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 [22]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 [23]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 [24]石家庄市图书馆文物考古小组:《河北石家庄市北郊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
- [25]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5期。
- [26]孙贯文、赵超:《由出土印章看两处墓葬的墓主等问题》,《考古》1981年第4期。
- [27]黄展岳:《汉代诸侯王墓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
- [28]大同市博物馆:《大同东郊北魏元淑墓》,《文物》1989年第8期。
- [29]徐州博物馆:《徐州西汉宛陶侯刘孰墓》,《文物》1997年第2期。
- [30]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进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1999年。

## Discussion on Archaeological Methods of Historical Period : Base on the Owner Identification of Han-Wei Period Mausoleum in Xigaoxue Village

XU Yong-jie

(South China Sea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Center of SUN-YAT 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

Abstract: In 2009, Henan Provincial Cultural Bureau announced the Han-Wei period mausoleum, excavated in Xigaoxue Village in Anyang County, was Mausoleum Gaoling of CAO Cao, King Wu of Wei Kingdom. The news triggered a bitter argument immediately and soon surpassed the owner identification and even involved scientificity and authority of archaeology. Based on the thoughts of the arguments, 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methods should be explored in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archaeological chronology, cross certification of the unearthed documents and the handed-down documents, the principle of "The only evidence is unreasonable", etc. thus will surely be beneficial not only to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but also to the suppression of the doubts about the owner identification and even about 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Key words: Historical Archaeology; Methodology; Mausoleum of CAO Cao